

# 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

## ——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 赵世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 一、关于“结构过程”

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进行的研究基础上,萧凤霞和刘志伟将他们的工作解释为对这一地区600年的“结构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这一术语可以作为不同区域历史研究共同的核心概念之一,也可以作为多学科区域历史比较的理论平台。

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人类学者,萧凤霞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的“结构”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使“历史人类学”有了统一的概念工具。她对“结构过程”的含义是这样表述的: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此表述还原到区域史的研究中,就是说,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认识特定区域内的个人或者人群怎样通过其有目的的行动,去织造出关系和意义的网络,也即制造出一个“结构”,其后,这个结构又影响着他们的后续行动。这个行动—结构—行动的延续不断的过程,就是历史。

其实,当我们讨论某一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时,并不会将其视为最初的开发及文化创造过程,在这个结构过程之前,已然存在形成区域历史的各种人类活动,不过,为了与此后的“再结构过程”相区别,将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定义为该区域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开发,而且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在随后的历史中发现。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初开始的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看到,而且在此前是没有发生过的。相对而言,此前影响区域历史的结构要素是个别的或者微弱的,甚至是潜在的。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虽然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时间段一般不甚漫

长,而且就在最近的百年内,往往是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对历史学者来说,区域历史所经历的“再结构过程”可能不止一个,而且绝不止数百年之久。于是,试图揭示这些过程的历史学者将会面对更大的困难。他们不仅要像人类学者那样面对空间或文化上的他者,还要面对时间上的他者,这些他者的眉目一个比一个更模糊。而且,如果确定某区域历史的再结构过程不止一个的话,就需要确定原有的结构如何破坏、新的结构要素如何替代旧的。就此而言,由于学科的特性不同,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大体上是单数的,而历史学者的“再结构过程”大多是复数的。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是向前看的,但历史学者的结构过程或再结构过程都是向后看的,难处就在于越向后看,材料就越少,结构性要素就越模糊不清,让人无法确定。以华北为例,我们不能像华南那样,从今天依然可见的历史遗存中,结合历史文献去确定那些明代以来的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因为不能断定哪些要素是明朝或清朝开始出现的,而哪些要素是宋朝或者元朝甚至更早就存在了。因此,华北的研究就必然是长时段的。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同时对早期文献重新进行审视,力图发现区域历史早期的结构过程和再结构过程。这时,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引以为傲的民间文献和田野观察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但人类学的视野依然是重要的,这会对古代历史提出新的解释。

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往往是通过观察现代社会去反观那个距离最近的结构过程的,因为眼前的种种现象,是这个结构过程的延续。我们或许也可以采用这种逆向的方法,去观察历史上的结构—再结构过程。比如,试图在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中发现前此某个结构过程延续下来的浓重痕迹,从而发现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结构要素,进而把握该结构过程。相对于它,明清时期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就变成了“再结构过程”。区别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和

再结构过程,要看构成原有结构的过程是否中断;判断这一过程是否中断,则要看特定的区域人群是否在继续编织那个“关系和意义的网络”。当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有人群或新的人群是否开始努力编织新的网络,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结构过程”。原有的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或者是近年来关于“变”与“不变”的讨论,也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路下得到重释。

## 二、关于“礼仪标识”

2010年,中国香港地区卓越领域计划(AoE)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启动,在项目的计划书中,科大卫提出了“重要礼仪标识”这个概念。当时的定义是:“地方社会的成员认为是重要的、实际可见的礼仪传统指示物。”尽管科大卫后来表示,他自己是从不喜欢下定义的,下这样的定义只是出于无奈,但是,某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核心概念可以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区分我们的学术主张与他人主张的标志,否则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在那里自说自话,甚或不知所以。科大卫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对我来说,严肃的田野工作就是我们学会如何找出并理解我们选取的乡村的仪式标记。一般来说,这些标记体现在明代以来兴修的建筑物的形制。我们可以把各时期修建的情况按时序排列,探问地方社会在这些建筑物出现之前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广东的佛山以祖庙著称,在祖庙出现之前,佛山是个怎样的社会?如果我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我就对明初的社会有多一点了解。”

科大卫给“礼仪标识”下了定义,即“地方社会的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客观且可见的礼仪传统标识”。他随后罗列了一些“重要的礼仪标识”,包括:称谓、拜祭核心(神、祖先等)、建筑模式(比如家庙)、宗教传统、控产合股、非宗教性的社会组织。虽然科大卫没有详细解释,但可知他定义的范围是比较宽的。所以,本文以为还会包括具有神圣性的自然物(比如榕树、社坛里的石头)、口述传统、壁画、雕塑等图像、仪式行为(如打醮)以及碑刻、科仪书等文本,不一而足。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是这样的“礼仪标识”,所谓被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等于就是被地方社会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

如果说,人类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有针对性地强调历史意识和时间性,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则试图用本土经验提升人类学的某些开放性概念和方法,在描述地方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重构更大空间的结构过程,“礼仪标识”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尝试的统领式概念之一。

“礼仪标识”之所以可以成为某种统领式概念,

在于它是人类文化的区分性标志,也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一方面,中国文化之与欧洲文化不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仪传统,中国的礼仪文本与仪式实践是互动的和统一的,即具有互文性,官方与民间的各种仪式传统你中有我,科仪文本与仪式行为我中有你。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区域社会史研究要“跨区域”,其实在整体的观照下,跨区域研究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即不仅在空间上,也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礼仪标识”,并通过“礼仪标识”,这些人群、文化传统,甚至空间被区分开来或者整合起来。科大卫在谈及“礼仪标识”的意义时曾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有兴趣研究地方制度怎样与国家挂钩的。这是一个‘国家建构’的问题。”但在这里的“礼仪标识”上,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面貌,即国家建构失败,或者地方制度与国家未能“挂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否与西南跨境地区的“不被统治”类似,因为这两个过程恰恰都发生在17世纪以降,处在几个日益崛起的强大殖民势力之间,因而是极值得探讨的。

## 三、关于“逆推顺述”

如果说“结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礼仪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就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本文认为,所谓“逆推顺述”,就是将在自己的田野点观察到的、依然活着的结构要素,推到它们有材料可证的历史起点,然后再从这个起点,将这些结构要素一一向晚近叙述,最后概括出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作为历史人类学来说,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在田野中观察到的只是今天的生活世界,但田野方法的本质对历史研究来说也同样适用。陈春声已然说明,置身于历史场景,感受地方民俗风情,在历史场景和历史记忆中阅读文献,必会加深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并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实创造出来。

这既是在田野中获取历史资料,在田野中观察和理解人的活动的历史,也是说如何对各种历史文献加以“田野”观察,将文献所述尽可能地还原到其产生和改变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和重释。因此,即使是历史学者,即使是先入为主地阅读了一些地方文献,历史人类学研究对地方的了解还是从田野、即现实世界开始的“逆推顺述”的目的正是为了揭示区域历史的节奏变化,因为“逆推”的起点虽然是当下的世界,但能“推”到哪里其实就是找到某一个历史上的节点,然后使这个节点再成为“顺述”的起点。最古老的中国史书《春秋》其实也是“逆推顺述”,孔子的逻辑起点是当时社会上下的“违礼”行

为,就是从他所在时代的失序或社会变动出发的,他所找到的历史节点就是“三家分晋”,于是《春秋》就从那时开始往后“顺述”。在这个意义上说,“逆推顺述”又不仅是一种研究技术和叙事技巧,而是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官修正史的传统从过往叙述至今,虽遵循了时间的线索,但目的在于表达法统的承接和国家的力量,而“逆推”是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旨在强调“当下”对于历史叙述的意义以及地方人群的活动对形塑历史的重要性。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受困于所研究问题的史料的缺乏,故而不得不常常采用假设和含混的表达,或是做适当的跳跃,用逻辑的连接替代证据的连接,因此“新史料”的发现往往引发轰动;研究近代历史的学者又往往受困于史料的纷繁,个人无法做到古史研究所倡导的“穷尽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故而在精细研究和宏观认知之间进退两难。但在当下的生活世界,这两个极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就像顾颉刚研究的孟姜女故事一样,人们口中的孟姜女故事包含了从先秦到当下的历史层累。对于“当下”的人来说,越久远的历史越是碎片,只有成为他们生活资源的部分才会保存下来,这与历史学者面对的情况差不多;同样地,即使晚近的史料再多,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没有意义,也会被人们无情地忘却。因此,现实世界的生存境遇是一个过滤器,它会告诉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历史研究怎样才会有意义,史料过少或过多的窘境也会因之得到一定的缓解。

层累地制造古史说的另一个方法论意义,是揭示出每一个稍晚的“层”都可以是稍早的“层”的“当下”,都是可以进行“逆推”的起点。过去我们常常提到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指的是米粮主要产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的变化过程。湖南、湖北、江西的农业发展与湖区的开发有很大关系,学者们的现场观察和民间文献搜集都可以将这一变化推到明初,然后讨论自明初以降的整体社会演变过程,成为新的米粮产区只是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也知道这一过程并非滥觞于明初,而要追溯自宋代,至少是南宋,那可能是另一个“结构过程”。宋代的遗存在今天当然是难得见了,我们的做法是将明代的传世文献当作“当下”的田野,看看那里面是如何描述明代以前的江西和两湖的,描述了该时期、该区域的哪些内容,结合考古发掘、信仰、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逆推”到上一个历史节点。我们已经知道两宋时期的江西已经出了不少名人,也知道江西商人在元代就已经活跃于西南边陲,那个时期的赣江及鄱阳湖流域已经不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顺述”,即按时间由远及近地叙述历史过程,是历史学者习惯的做法。但因“逆推”作为前提,“顺述”的起点及其所涉内容就可能

会有很大不同。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个起点往往只能是国家或者王朝的预设,我们的王朝断代史就是个典型。比如我们讲明朝的事,往往从太祖开国讲起,顶多从元末起义开始,于是历史叙述就被限定在了王朝叙事的框架内。假如是一部个人生命史,当然也可以从出生讲起,一直讲到生命的完结,这当然是遵循着生命的自然周期,不过也就被限制在其个人叙事的框架内。但一个王朝,只是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的一个过客;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可能脱离他身边的人、事得到描述,当我们从众生的行动及其后果去描述王朝,或者从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去描述他,叙述的起点就会不同,“顺述”的内容也会不同,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经历的事是不一样的,即使经历同样的事,他们的反应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些反应反过来对国家或者王朝制度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经过“逆推”之后再“顺述”出来的历史,就可能是一部不一样的历史。

站在普通人、小人物,甚至是弱者的立场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从人的活动而非概念化的国家出发理解历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顾颉刚的倡导和年鉴派的实践,都可以从90年前说起,华南研究的工作也已开展了30年。但是,我们是否已经通过一个个区域研究的个案,重新绘出了一幅历史中国的新貌呢?虽然前景可期,但目的还没有达到。很多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还没有通过大量精细的研究揭示出来——当我刚刚从晋祠对面的北大寺、古城营两村调查归来,就看到金胜、董茹等村的城改签约新闻,我们还不能提供一个可与珠江三角洲的结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北方范例。许多“礼仪标识”在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剧烈冲击下消失不见了,使我们失去了借以透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的表征——在山东济宁的南阳湖畔,发现了一块嘉靖二年的临清卫左所的社坛碑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但这类“礼仪标识”过去不是相当普遍的吗?没有了这些“礼仪标识”(或类似的历史遗迹),却充斥着许多伪造的“遗产”,又如何能“逆推”到地方历史的某个可供“顺述”的起点?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和材料做一块立体的镶拼图,这块镶拼图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很难完成的。许多不同的主题碎片叠加成一个小尺度的区域历史板块,然后逐渐凑成一个较大尺度的区域历史板块。由于材料和投入的限制,这些板块之间一定会有许多连接不上的空隙,那些主题碎片的叠加也会高矮不一,但待到较多的区域历史板块被如此这般地镶拼起来之后,这个镶拼的过程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明白却做起来不易的游戏。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约17000字